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主办 第3期（总第411期） 2024年3月5日

- ◆ 2024 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新华社(1)
- ◆ 联合国秘书长龙年贺词.....古特雷斯(9)
- ◆ “老农吴镛”深情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吴 镛(10)
- ◆ 不能取消“农民工”的提议.....郭书田(22)
- ◆ 正确把握“三种关系”.....吴协恩(23)
- ◆ 胡耀邦与“包产到户”政策突破.....赵树凯(25)
- ◆ 实施中国食药促进会九大品牌建设.....谢久忠(30)
- ◆ 我有一个中国梦“千万工程”容我报.....孙鸿良 岳绍先(32)
- ◆ 一号文件里的“三农”脉动.....仲农平(38)
- ◆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里程碑式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43)

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农业农村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扎实做好2024年“三农”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以下简称“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全力抓好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生产，统筹推进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持续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确保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着力夯基础、稳产能、防风险、增活力，坚决守住“三农”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任务，努力推动“三农”工作持续取得新进展新提升。

一、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压实责任稳面积。**严格开展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将粮食、大豆和油料生产目标任务下达各省份，着力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7亿亩以上。**统筹要素提单产。**深入实施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分品种制定落实好集成配套推广工作方案，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实施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扩大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启动小麦单产提升行动。开展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强化扶持稳收益。**推动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稻谷补贴。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

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

（二）巩固大豆油料扩种成果。纵深推进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确保大豆面积稳定在 1.5 亿亩以上、油料面积稳中有增。**多措并举稳大豆。**实施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粮豆轮作等政策。引导东北地区合理轮作减少重迎茬，支持推广种子包衣、接种大豆根瘤菌等技术。用好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确保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等适宜地区推广面积稳定在 2000 万亩。启动实施大豆单产提升工程。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多油并举扩油料。**支持利用冬闲田增加油菜面积，合理轮作发展春油菜。实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动，在油菜主产区整建制集成应用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在黄淮海和北方地区轮作倒茬扩种花生，因地制宜发展油葵、芝麻等特色油料生产。积极推进节粮减损，开展“减油增豆”科普宣传，引导逐步降低食用植物油超量消费，提高大豆及其制品消费。

（三）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优化调整生猪产能。完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适度放宽调控绿色区间下限。督促地方稳定用地、环保、贷款等基础性支持政策。**推进草食畜牧业转型升级。**深入开展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推动完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标识。扎实推进粮改饲，建设高产稳产饲草料基地。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四）推进现代渔业发展。发展水产健康养殖。制定全国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稳定养殖水面空间。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行动，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积极发展贝藻类养殖。**拓展渔业发展空间。**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稳步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做优做强远洋渔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渔船和渔港管理体制变革，建设沿海渔港经济区。完善休禁渔期制度，分海区巩固扩大专项捕捞许可范围，规范增殖放流。加强渔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警示。

（五）统筹抓好棉糖胶生产。调优棉花。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与质量挂钩政策。稳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提升糖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加快补上脱毒健康种苗应用、机械化收获短板，建设糖料蔗高产高糖基地。**巩固橡胶。**实施天然橡胶资源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提升行动，探索推广应用智能割胶机械，加快天然橡胶老旧胶园更新改造，建设特种胶园。

（六）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制定做好全国“菜篮子”工作指导意见，修订“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压实“菜篮子”产品保供责任。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遴选一批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及基地。**推进设施种植升级。**集中连片推进老旧设施改造提升，在大中城市周边建设一批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在保护生态和深度节水的前提下，支持西北寒旱地区和戈壁地区发展现代设施蔬菜产业。**提升设施养殖水平。**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因地制宜发展楼房养猪、叠层高效养禽等立体养殖。推进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积极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建设一批智慧农业引领区，推动规模化农场（牧场、渔场）数字化升级。深入实施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建设国家智慧农业创新中心。健全智慧农业标准体系，推动建立检验检测、应用效果评价和统计监测制度。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开展大食物监测统计，推介大食物开发典型案例。

（七）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科学防范气象灾害。加强灾害性天气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和工作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落实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等关键措施。**加强病虫害和疫病防控。**实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统筹推进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持续抓好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推进重点人畜共患病源头防控。加强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深入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建立防灾救灾农机储备和调用制度，加强基层农业防灾减灾队伍建设，研究建立区域农业应急救援中心。

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八）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优化动态监测。调整防止返贫监测范围，适时开展集中排查，压紧压实防止返贫工作责任，确保应纳尽纳、应扶尽扶。推动防止返贫监测与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共享，强化筛查预警，提高监测时效。**落实帮扶措施。**推动部门落实责任，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户全面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监测户做好兜底保障，对存在因灾返贫风险农户符合政策规定的可先行落实帮扶措施。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九）分类指导帮扶产业发展。制定分类推进脱贫地区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实施脱贫地区帮扶产业提升行动，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巩固一批。**支持市场前景广、链条较完备的帮扶产业，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推进产销精准衔接，创响区域公用品牌，促进融合发展。**升级一批。**支持资源有支撑、发展有基础的帮扶产业，加快补上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升级田头保鲜、冷链物流等设施，促进加工增值。**盘活一批。**推动采取租金减免、就业奖补、金融信贷等措施，支持暂时出现经营困难或发展停滞的帮扶产业纾困。**调整一批。**及时调整发展难以为继的帮扶产业，妥善解决遗留问题，立足实际规划发展新产业。开展帮扶产业及项目资产运行监测，组织开展帮扶项目资产状况评估，建立健全资产管理机制，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

（十）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拓宽外出就业渠道。**推进“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鼓励各地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培育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加强就业帮扶车间运行监测，引导具备产业升级条件的帮扶车间发展为中小企业。统筹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十一）深化区域协作帮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分区域制定农业农村发展实施方案，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研究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强重点县帮扶。**指导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加强整合资金使用监管，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加强对口协作帮扶。**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深入实施携手促振兴行动，推进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帮扶。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扎实做好农业农村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工作，协同推进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帮扶和乡村发展。**加强社会力量帮扶。**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

三、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打牢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十二）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定实施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建设力度。**提高中央和省级投入水平，创新建设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多元筹集建设资金。实施好特别国债高标准农田等建设项目，完成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年度任务。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强化质量监管。**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常态化开展工程设施质量抽测。完善农田建设长效管护机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

（十三）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升耕地地力。深入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1亿亩。推动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建设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集成推广耕地质量提升措施。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推进“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保护耕地资源。**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推动实现“占优补优”。细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合理安排恢复时序。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利用，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对确无人耕种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途径种好用好。加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力争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并形成阶段性成果，推进土壤资源库建设。

（十四）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前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端技术模式集成、后端适用技术推广，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自主创新。**制定农业科技创新战略要点。全面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农业“火花技术”，尽快在底盘技术、核心种源、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等领域取得突破。**提升创新条件。**调整优化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区域引领性种业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企业实验室和企科创新联合体。遴选一批创新型国家农业阵型企业。建设第三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快推广应用。**建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队伍和条件建设，强化农技推广体系与科研院所、科技服务企业贯通合作。持续建设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打造农业科技强县样板。

（十五）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筛选挖掘大豆、玉米等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建设国家畜禽和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推进育种创新攻关。**深入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快选育推广高油高产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等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加强育种制种基地建设。**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和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建设南繁硅谷、黑龙江大豆等国家级种业基地，新遴选一批制种大县、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畜禽核心育种场。加强品种试验审定管理，推进实施种子认证制度。

（十六）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推进先进农机创制。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建设“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建设农机装备研产推用贯通应用基地。**推广适用农机。**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实行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资金兑付方式，推动优机优补。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定“绿色通道”。**提升农机服务能力。**建设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加强机手作业技能培训，深入推进机收减损。

四、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发展绿色转型

（十七）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常态化开展部门联动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加强以长江流域为重点的渔政执法能力建设，强化智能设施应用。推动提高退捕渔民安置和社会保障水平，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及时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实施好“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和就业帮扶“暖心行动”。**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强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发布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开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调查，加大力度深入实施中华鲟、中华白海豚等旗舰物种保护行动计划。加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强化涉渔生态补偿措施落实，推进水生生物栖息生境修复。

（十八）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实施科学施肥增效行动，选择一批乡村整建制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推动农药减量化，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展。加快修订禁限用农药名录。**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深入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支持养殖场户建设和改造提升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一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推进秸秆科学还田、高效离田。开展地膜联合监管“百日攻坚”行动，严禁非标地膜入市下田，促进地膜科学使用处置。以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为重点，扩大整建制全要素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试点。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

（十九）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制定生态循环农业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生态循环农业产业体系。**推广绿色技术促进小循环。**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培训，推广应用绿色高效品种机具，因地制宜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粮畜菌果等生态种养。**推进种养结合促进中循环。**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培育一批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种养适配、生态循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大循环。**建设一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基地，推动全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开展省级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

（二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深入实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快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标准化生产。**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品质分级体系，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开展豇豆、水产养殖重点品种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加强其他合格率偏低品种监管。强化农产品检测，推广应用新型快速检测技术，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和信用监管覆盖范围。**培育精品品牌。**完善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建设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优质特色产品品牌。办好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展会。

五、全链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十一）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提升特色种养。支持开展特色种质资源收集普查，筛选一批性状优良的特色品种。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遴选一批热带作物标准示范园，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调优水果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发展现代果园，完善采后处理、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促进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做精乡土特色产业。**加强传统手工艺保护传承，发掘培育篾匠、铁匠、剪纸工等能工巧匠，促进传统工艺特色产业发展，创响“工艺牌”、“文化牌”等乡土品牌。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镇，发展一批特色粮油、果菜茶、畜禽、水产品、乡土产业等村镇。

（二十二）高值提升农产品加工业。改进技术装备。支持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鲜切包装等初加工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新型杀菌、高效分离等精深加工技术。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技术科研试验基地，完善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推进延链增值。**绘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加工树”图谱，引导加工企业开发多元加工产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建设一批全产业链典型县。推进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开发稻米油、胚芽油和蛋白饲料等产品。引导各地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

（二十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融合载体。优化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建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分区分类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动建设一批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促进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农文旅融合。**实施休闲农业提升行动，建设一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遴选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开发差异化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和服务。**健全联农带农益农机制。**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二十四）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健全冷链设施网络。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支持建设一批田头冷藏保鲜设施，推动建设一批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共建一批国家级农产品产地市场，推进交易服务、仓储物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推动建设一批县域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基地，促进优质农产品上网销售。

六、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二十五）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稳步推进农村改厕。指导中西部资源条件适宜且技术模式成熟地区稳步推进户厕改造，积极开展干旱寒冷地区适用技术产品研发与试点，探索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的奖补模式。具备条件的推进厕所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一并管护。**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排查和源头治理。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整体提升村容村貌。**建立健全常态化清洁制度，有序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

（二十六）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建设任务统筹。推动省市县编制乡村建设年度任务清单，规划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县为单位建立乡村建设项目库，合理安排建设优先序。健全全国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完善工作推进考评机制和问题发现处置机制。**推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补短板。**开展村庄微改造、小改进、精提升，稳步提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协调推进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向国有农场延伸。开展农村公共服务重要领域监测评价，征集推介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深入实施“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

（二十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新推广有效治理办法。推广清单制、积分制、“村民说事”等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推进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丰富拓展制度性治理方式。启动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鼓励地方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新路径，宣传推介一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通报表扬一批移风易俗专项治

理工作先进县（市、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便利条件。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二十八）推进乡村文化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组织“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推出一批“三农”领域优秀文化作品。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坚持农民唱主角，鼓励支持基层和农民群众自主举办“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积极搭建农村文化展示平台，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开展乡村文化资源摸底调查，启动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认定，申报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设农耕文化大讲堂，开展“农业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宣传活动，实施“农遗良品”培育计划。

七、稳妥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

（二十九）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承包地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土地流转合理价格引导机制。探索完善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配套措施。**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改革试点，持续推进宅基地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农民户有所居保障机制，加强基层宅基地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完善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政策，建设全国统一的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平台。出台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稳步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总结推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农村改革经验模式。

（三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整建制推进试点，创建一批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办公司观察点跟踪指导和经验推广。深入开展“千员带万社”行动，鼓励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等各类组织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周期提供服务。全面实行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服务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细化服务技术规范、作业要求，强化服务效果评估。**提升农垦辐射带动能力。**深入推进垦区区域集团化改革，分类指导农场企业化改革。实施“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支持面向地方开展全产业链服务。开展农垦土地管理与利用情况监测，完善农垦土地管理利用方式。实施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行动。

（三十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健全监督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动出台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收减免的政策。指导有条件地区探索开展集体收益分配权有偿退出、继承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健发展，鼓励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发展途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服务。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规范流转交易。**稳妥有序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落实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工作。推进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建设，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机制。

（三十二）推动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认定第四批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加快潍坊、宁夏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进境内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和境外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支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现代农业领域合作。

八、强化支撑保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三十三）强化乡村振兴统筹协调。健全推进机制。落实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以及乡村建设工作指引，细化工作方案，及时跟踪调度，推动工作落实。**强化考核督查。**扎实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强化考核评估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日常监测评估和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推动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开展示范创建。**深入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探索不同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方式、发展模式和实践路径。推动开展乡村振兴表彰。

（三十四）健全多元投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推动各地落实土地出让收入支农政策，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支农规模，加大财政对乡村振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保持总体稳定，强化绩效管理，优化项目管理方式。**扩大信贷资金规模。**优化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服务，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对接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实施现代设施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贷款贴息试点，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提升全国农担服务效能。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发挥农业保险作用。**推动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全国覆盖，扩大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地方拓展优势特色农产品险种。推动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完善“保险+期货”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修订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发挥乡村振兴基金作用，引导地方利用好农投公司等平台，有序扩大农业农村投资。

（三十五）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实施“神农英才”计划等专项，组织开展中华农业英才奖评选，遴选一批高层次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健全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推动扩大“公费农科生”实施范围。推动建立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定期服务乡村制度，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专家服务乡村。**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深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和“耕耘者振兴计划”，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开展“全国十佳农民”遴选资助。健全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深入开展涉农干部乡村振兴培训。

（三十六）加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农业法、渔业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修订，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深入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常态化开展执法练兵，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加强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检疫、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执法。**强化法治宣传。**加快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建设一批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普法主题活动。加快推进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全程电子化。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坚持守正创新，把住“三农”工作底线红线，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强化统筹协调，对牵头推动的工作紧抓不放，对协同配合的工作主动作为，落细落实工作措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增强工作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谱写新时代“三农”工作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农业农村部官网。2024年1月10日）

联合国秘书长龙年贺词

古特雷斯

春节快乐！恭贺新禧！

在龙年到来之际，我谨向大家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龙象征着活力、智慧、守护、吉运，正是我们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所需要的特质。

今年联合国的庆祝尤其不同，农历新年首次登上联合国节庆日历，我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多边主义和全球进步的坚定支持，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就能实现一个可持续、公正与和平的未来。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兴旺发达，谢谢！

（来源：新华社。2024年2月7日）

“老农吴镛”深情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

吴 镛

前 奏

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37号文件，江苏省委研究室就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武进的鸣凰公社去调查住了两个月。当时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的哥哥吴志光，后来的无锡市人大主任周解清，省乡镇企业局长、发改委副主任邹国忠等等。

当时的三十七号文件，讲要减轻农民负担。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是最熟悉农业的，又是搞农业出身，他多次讲过，在湖南时候就讲过，后来到北京也讲过，我们农民兄弟栽秧很苦，第一兜是给中央栽的，第二兜是给省、地委，第三兜秧给县委，第四兜给乡里面，第五第六兜秧才轮到我们自己。一排秧就是六棵，他们讲兜，我们江南人讲话叫六棵秧。当时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支持工业化，剪刀差上面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当时稻谷非常便宜，一、两毛钱一斤，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就建议中央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把水稻价格提高，到20%-25%之间，这个报告从省委送到中央，然后中央就采纳了江苏意见。

1978年稻谷收购价就提高了22%。我想农村改革是一个组合拳，不是光一个包产到户，而是由扩大自留地，借田、开放集市贸易等组成的，特别是农产品提价第一炮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就打开一个口子，使农民收入稍微增加了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农村改革的前奏。

包产到户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中国；二次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自己的。”真是简单明了，一听就懂。2002年，杜润生同志九十大寿。七月十八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聚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同志讲到，年轻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所工作，在电梯上遇到杜润生同志，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的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评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做了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因此使得一些干部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包

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是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引起轰动。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全省上下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1979年9月28日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提倡搞“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不过，华国锋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倒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这是中央领导最早的表态。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三月十四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头版就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胡绩伟后来在南通对我说，真理标准问题顶住了，但张浩事件没有顶住，是个遗憾！但当时确实难顶。王任重还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村改革，会上争论激烈。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争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人讲话都上了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7日）的文件，即著名的“七十五号文”，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为“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说“依存”，就是说本身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总算在“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地区”等，“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分散决策”，责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个基础。1980年11月5日，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阳光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的文章，后来得了经济学奖，杜润生在《自述》（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中也有描述。）

事情的正式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在1983年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文件书面语言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陈云、先念都赞成。

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余国耀，于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总书记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八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包产到户，再补充个细节小故事。江苏省委一次开包产到户方面的汇报会，各个调查组都汇报了，最后一个老部长汇报，他说我接到省委通知以后，三天没睡好觉，我是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省委书记说你不要翻来覆去了，你讲你的结论是什么？老部长讲结论是四个字。书记问：四个字是什么字？老部长说：很难讲的。因为高压之下说不清楚和不敢说清楚。书记叫我说一说，书记说你不能也是很难讲的。我说是这样的，我已经印发一个材料，标题叫谈话记录，发在各位常委的座位上，书记说你就讲讲记录什么意思吧。我说我是纯客观的记录，从记录上来看，越是干部大的越反对包产到户，越是基层的贴近农民的，越是拥护包产到户。还附了盱眙县的调查表，区县公社大队那几个地方，包产到组的不如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的不如大包干的一个产量对比表。

那么你的看法呢？我说我的看法是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就是纯客观的反映。散会以后，省委的常务书记胡宏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理解你，干脆讲讲吧。我说刚才讲的很明确，包的越彻底，产量越高。胡书记桌子一拍，好，看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他是个四川人，因为过去粮食收到生产队的仓库里，生产队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东西，有粮食了开会夜里可以吃个晚餐，煮点稀饭喝喝。现在想想可怜。但是现在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粮食多往自己家里送了，交集体也很少，所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段插曲吧。

包产到户，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争论，到底包产到户好不好？你华西大队和南街村不搞包产到户，不是也很好吗？所以中国之大很复杂，不一定一种模式，可以多种模式，所以中央后来是讲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那么关于包产到户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是在1979年，中央农委开了个前门饭店会议，实际那个时候还叫向阳招待所，有6个省市区的6个农委主任到会，安徽农委主任叫周曰礼，他是大大有功的，他一个人在会上讲了半天，讲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和好处，归根到底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农民是私有者出发，把大田作为自留地那么种。我当年对杜润生同志说过：大公无私是圣人，先私后公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贪污盗窃是坏人（这话发明权是江都的农村干部）。党的政策要从常人出发。雷锋那样的是少数先进人物。

中国国家太大，发达地区跟困难地区、三靠地区，差别也太大，所以应该分散决策，可以分散风险，这就叫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就是杜老发明的一个办法。试验、等待、妥协、逐步总结和推进。杜老告诉我们，每一个中央文件都是妥协的结果，是各方争论，然后求得最大公约数，来平衡一下，来协调一下，这样就发出文件来了。我们称赞杜老是“善于折冲”。万里说：我们说话太直白，经过润生这么

一绕弯子，慢慢说，就说开了，说通了。润生有这个本事。”我们江苏其实搞包产到户比凤阳还早了半年，泗洪县上塘公社有一个垫湖大队包产到户比凤阳还搞得早，现在他们也办了个包产到户的博物馆。当然现在以凤阳县的小岗村为代表的没有问题。一个事件总是找一个代表，地区和代表人物，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代表人物胡福明，也还有别人的贡献。所以包产到户，池必卿、周曰礼等，是不可忘记的人物。后来杜老多次跟我讲过，周曰礼不简单，在当时情况下，他一个人讲了半天。现在不知周曰礼还在不在人世。

改善流通

前面讲了农村改革是个组合拳，是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尚书》里面的《洪范篇》就讲国有八政，第一是食，民以食为天。第二是祀，祭天祭地祭社稷，可以天人和諧，是人伦之大事。第三就是货，货物的生产、流通。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做这个文章，他讲通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范蠡，是商业之祖。匈牙利的学者科尔内写了一本书，叫《论短缺经济》，（又译《短缺经济学》）。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中国一直是短缺经济，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西瓜要西瓜票，喝茶要茶叶票，买豆腐要豆腐票，我结婚的时候发了布票没钱买，还把布票送人了，所以钞票跟票证要正配。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后来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了半斤肉票，一个南大的教授就在肉票后面写了几个字：猪兄久违，卖猪肉的人阶级觉悟很高，一看就交到派出所了，他们以为是“反标”。这几个字是谁写的？后来全市一排查是南大的一个教授、书法家写的。他说我写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是好久不见了猪肉，我买了一块猪肉回来把它供在桌子上，朝他鞠了三个躬。猪兄猪兄，久违雅教，在下已3月不知肉味。196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同志出差，到了常州，住在常州一个小营前招待所，早上吃早饭，端上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惠老一看大发脾气，问谁搞的？市委书记杜文白说，我也不知道是下面人搞的，既上来了我们就吃吧。惠老说，你就胆子这么大，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你敢吃。后来办公厅的金靖中同志就说了，他们首长是不能吃的，我们是老百姓随员，我们就吃点吧。惠老说也不行，谁也不能吃，哪个都不能动筷子吃下去。大家就嘴里咽着吐沫，眼睁睁看着把那一屉热腾腾的小笼包子端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党风好，党纪严，确实是这样的。）

商品流通一向是管得很死，多环节，少渠道，我们国营商店卖的水果叫留着好的卖烂的，卖了烂的又烂好的。到最后一个好的水果也不容易吃到。那么后来我们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每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抓生产必须抓流通，流通领域有几件大事，应该是从1979年起，国家大幅度的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第二是开放集市贸易，第三是放开一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南方先放，放“两水”，水果、水产。水果水产开放。吃西瓜就不要凭票了，就可以自由买了。

这样一搞以后，有个问题来了，我们讲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那么“两水”一放以后，放了不要票，价格就上涨了，上涨了以后有些人说不行，你赶快管，后来中央说不要急于收，等一等，看一看，结果放了，价格上涨了，生产上去了，生产上去了多了以后，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生产也平衡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放-涨-上-降-平”这样新的格局，市场一派繁荣，多渠道少环节，改变了过去“收统-放乱-管死”的老格局。当然，由于小生产对接大市场，市场上多拉多来少拉少，还是难免的。

那个时候，我们省人大主任储江同志经常讲农民的主要问题是买卖两难，他是用宜兴话讲的，特别

有韵味。但是，主要靠市场调整，慢慢趋于平衡。

这时候，最早也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流通。江苏北部农民地多粮多，养鸡贩到人多地少的苏南。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车队浩浩荡荡，称为“百万雄鸡下江南”一大奇观。万里等同志很欣赏。那些鸡贩子曾被讥为“二道贩子投机倒把”。胡耀邦同志则称赞，靠了这帮经纪人的中介，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他们正了名。农村专业户、饲养能手得利了，也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显得扬眉吐气。

当时我把这一景况写给“农民日报”，登上头版头条。一时间“百万雄鸡下江南”成为常用语和新风尚。

但是，事情总会有些曲折。在新闻评奖时，有人就说：“一是不严肃，比喻不恰当。毛主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怎么能比鸡呢？二是说了雄鸡，那么母鸡呢？”我答，母鸡在下蛋供城里人吃呀。小公鸡先卖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上刮起一股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就关于治理整顿一个写了个决定，省委书记韩培信就到南通来，老吴你看看这个稿子有什么问题，我一看确有不少问题。如在稿子上写了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搞私营企业、搞批发。我就想了“百万雄鸡下江南”不是长途贩运吗，而且不消耗能源，是人的生物能源去拉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钱用汽车运，这有什么不好的？后来正式定稿的时候，把不准长途贩运这一条删掉了。但有的还没有改，如不准私人从事批发业务，这一段没有改，现在看来也很不妥当。当然后来逐步纠正了，但这些历程不应该被忘记，应该作为我们的教训。所以流通领域的改革，当时斗争也是很厉害的。

最后中央还是做了正确的结论，所以后来一号文件里面专门强调了，怎么来解决流通的少环节多渠道问题，我们在江都的宜陵镇调查，写了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指出供销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大商铺供销社要帮助农民小商小贩，这叫大鱼帮小鱼。费孝通就很欣赏，说老吴你们发明一个新社会的规律，过去是大鱼吃小鱼，你们现在大鱼帮小鱼这个好。所以流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情，也可以称农村的商业革命。

所以我说农村是经历了几场革命，包产到户是农业本身的革命，乡镇企业是工业革命，商品流通大改革是场商业革命。

乡镇企业

小平同志讲，完全没有料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华国锋讲了，光明灿烂的希望是乡镇企业，但开始也是争论不休的。

其实 1958 年江苏就开始搞了乡镇企业。无锡的东亭公社搞的农机修造厂生产小化肥，然后江阴的华西吴仁宝也搞了“开关”厂。就是说上面有人来检查了，赶快搞农业，把厂关了，把农民社员赶到地里去干生活。检查组一走，好，农民又上来了，到工厂开工了。所以时称“开关”厂。种田是从鸡叫忙到鬼叫，挣不了几个钱。光种田是太苦了，必须要办工业。这是农民的一个创造。农村也可以办工业，我认为是农村的一场工业革命。但这个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一是落后挤先进，二是以小挤大，三是以集体挤国营。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私营工业，小集体与国家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那时一些老革命回家乡，会看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陆定一回无锡一看，不错，乡镇企业好的。同乡薛暮桥到钱桥钢厂一看，说怎么行，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

来这么多电？后来姚依林等领导人到江苏，也在怀疑，“乡镇企业能出这么好的产品吗？”薄一波也来江苏，他说，我是山西人，关公的老乡，我带了大刀，会砍你们的东西。后来他看乡镇企业确实不错，他又说，看来我的大刀砍不下去。争论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4号文件中指出，现在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中央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了首次乡镇企业的展览会，国家副主席王震来剪彩，工作人员一律的西装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北京人说农民工厂做的西装这么好，卖给我们穿穿吧。84个国家的大使在彭冲同志带领下来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副总理来参观。秀莲就讲了，田副总理写篇文章支持支持我们，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写，吕是国家经委主任。吕主任说，我写不了。顾秀莲说，叫吴镕写好个代拟稿，你看得好的话，签名发出，稿费归你吕主任的。吕东笑说，那敢情好。他看稿后一字未改，签上大名。所以当年9月24号人民日报第二版登了大半版的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了，大家很高兴，没得话讲。到了1985年，在1984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点减产。陈云同志也讲了，我看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农业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所谓“跑步前进”不正之风也怪到乡镇企业，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文章，不正之风的风源在哪里呢？不是乡风，也不是南风，是北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当时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也叫粤南模式。是三个“南”。广东佛山那里乡镇企业很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甚至2/3。很多乡镇企业后来就发展为国际性的（企业），像红豆集团开到柬埔寨，这是后话了。现在乡镇企业也成了大企业，还成立了党委、董事长、党委书记。所以乡镇企业一直是在批判中前进，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乡镇企业从“三就地”（就地原料，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逐步转到高精尖外，乡镇企业，如浙江的万向集团、正泰集团等等，都非常好。

所以当时江苏农民就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商业富起来；第二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都上报了中央。万里和杜润生同志很欣赏。吴象说产业上是三句话，还要加一个人，无才不兴。

这个档口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简称“中央农研室”）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1986年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他首先肯定当时经验还是不错的，对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这三句话，特别前两句话，也的确有其不足之处。他说如果我们认识仅仅只限于无农不稳，就会合乎逻辑的产生一种思想：我这里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所以这种社会稳定程度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大力发展农业了。当然他也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他认为这三句话有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并没有全盘否定，但是他又强调，如果不去指出不全面的地方，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我认为，一个口号一种提法是为了强调某些方面，不一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打比喻也是这样的。列宁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它主要观点对了就行了。

为了表达这些论点，我在同一个刊物第98期上登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且在《经济日报》一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三句话是“三位一体”，是“三足鼎立”，撑起了个农村经济》，表明群众创造的经验非常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客观规律和现实，无可指责。这个事情一直反映到上面，

那一天正好在北京开会，陈锡文就悄悄跑来说，老吴，告诉你好消息，总书记讲话了，你们这三句话是正确的，没有错。总书记说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办工业、商业条件的地方就富和活起来了。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我们要根据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看一看，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不就是这么一条路吗？这一段话为这次事件做了很好的结论。当然后来我跟于光远也成为了忘年之交，他每次到江苏都来看我，我也不敢当，我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请教。

我当时答辩文章当中强调，无农不稳，并没有排除农业也可以成为致富之道。但到现在从总体上看，单一的农业经济还是难以致富的。如剪刀差等原因，农民说是政府要谷子，农民要票子，干部要面子。大家在比 GDP，但农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低啊！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多无偿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怎么出来的？先是剪刀差，后是农民工，最后是落到农村的土地，土地财政，这都是农民的贡献。所以我们当时光江苏农村就提出来，发展循环性的大农业，叫十字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特别是大力发展服务行业。

现在我看这“无农不稳”四个个字还没有过时，过去是叫以粮为纲，其它砍光，错了。当然，粮食是国民之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粮食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无工不富也没有排除无工也不稳，要因地制宜。无商不活，也没有排除商业同样是致富的条件。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流通问题往往大于生产问题。

小生产难以对接大市场，总的看起来三句话现在还没过时，美国纽约时报为这三句话发表了社论，当时《中国合作经济报》是全文转载了我才看到的。纽约时报社论强调，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口号。外国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央提出来的前瞻性的战略口号。

当然了，于老说研究问题切忌抽象化一刀切，他的教诲还是很中肯的，他的思考也启发了我的思辨。他也写了许多超短文，送给我。我也学他写点超短文。当然我的水平跟他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对后辈的示范和教诲我是终身难忘的。

乡镇工业的问题，大家熟知的很多了，当时我们叫“四千四万精神”，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船万担。这些等等，大家熟悉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乡镇企业的争论当时的确是很厉害的。

放活金融

下面再讲讲放活农村金融。生产流通搞活跃了，金融问题又突出起来。一些非农村工作部门与农村工作部门之间常常观点不一致，中国又没有农会，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被戏称为“农民议会”，基层的农村工作者代表农民利益，到会上去倾诉。

在草拟中央文件前后，中央农研室也经常要我们地方同志与中央部门负责人对话。那时较多的是与商业部（粮食、商业、供销三部合并）部长刘毅及民政、计委等负责人对话。办法是开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田纪云副总理等。

1983年后，江苏和四川两省农村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农民合作基金会，以纾解农民存贷款难的问题。当时有些议论：“农业银行进了城，信用社也变了身（从合作变全民）”。农民被迫自己又组织起来搞了合作基金。

为起草 1985 年一号文件，中央农研室金融组黄鸣等同志准备了一大堆搞活农村金融的调研材料和

建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志，人称“铁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来与她对话。她下午三点钟到会，声称“我四点要接待外宾，你们有话快说”。杜老就叫我先说，我用八分钟讲了五点建议。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你讲的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五条意见，我同意四条，唯有“大跃进时一些老贷款还不了，一风吹吧”这一段不能同意，贷款上可不能像平反错案那么“一风吹”。不过也可以考虑，那时刮瞎指挥风，农民已经受了苦，就暂按“挂账停息”处理吧。我笑道：“谢谢行长恩典，帐挂着，看来也只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了。”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不到半小时就轻松结束。与会人员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这以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有了大发展。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就写了“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是金融领域一大突破。我们如今念叨的农村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其实那时就从生产到流通到金融，都允许“放活”，且明文载入了中央文件。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产生了一些不良贷款，还有极少数腐败案件，朱镕基后来决定，全面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我专门写了江苏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和问题，指明江苏这方面主流是好的。但因为命令已下，虽有批示说可以进一步调查研究，已经来不及了。好在如今经过审时度势，中央银监会等又开了口子，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民间信用组织重新启动。但那一段弯路的人财物损失不小，可引以为训。现在看来，农村合作金融重新起步后，步伐并不快，门槛仍偏高，亟需进一步引导、扶持。

雇工问题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这个事情也有多次的反复，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年广久不能逮捕。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农业一号文件的同志做了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会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二至三个学徒，三至四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分成分，有些人土地占用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前辈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个也不大够。

开会争来争去，加上下省区调查研究，当时大多数人取得了六点共识：

1. 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共性的东西。

2. 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3. 马克思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4. 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生产关系。

5. 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6. 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不能捣巢伤卵。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1989年下半年，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和党委书记的已大有人在。这就大大超过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乡村体制

乡村的体制改革。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了乡镇建设，大体上是一个公社一个乡，一个大队是一个行政村，一个生产队作为一个村民组，撤社建乡以后运行不久，1984年的夏天，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带着中央一个讨论稿文件，到江苏来，他说这是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意见，乡太大，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来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狗是黑的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二点四万，面积四十五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实个别省已经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一九八五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晚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明天上午就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咪咪地告诉我：“小吴啊，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十万人左右，面积八十至一百平方公里。

从那次与崔部长讨论乡镇建制后，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崔部长常主动来找我议论农村的事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我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我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那么现在看来乡镇是越来越大了，比过去好多了。

我当时在香山饭店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在走廊上看到万里走过来，问我你这个年轻人从哪来的？我说是从江苏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饭店？我就答是香山饭店。你晓得饭店多少钱一天？我不知道。他说贵得很啊，你们开会不能到这里来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杜润生同志叫我们一帮人来搞一号文件什么的。他马上笑了，说老杜啊，那可以，然后就走了。那次也是个巧遇，他怪我这么贵的饭店，你们年轻人跑到这儿干什么东西？我说杜润生同志讲，过去在城里开会，哪怕到八大处都靠市场太近。香山饭店地方比较偏，人家也不会来，你们也不会到城里去，安安心心坐在这旮旯里，把中央文件好好琢磨琢磨，这个虽然贵一点，但是比较安静。

清污问题

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本来一九八七年的一号文件已准备好。但因为全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前面几个文件都让给“清污”问题了。农村文件压到了第五号才发出。

很多国人喜欢跟风。全国反污染。江苏盐城市委农工部一位负责同志立即写了一篇《农村精神污染十大表现》，我一看不对头。这时江阴一个船老大反映：“共产党是穷人党啊，要共产的。旧社会富人被绑票，新社会要改造。这次搞不好又要坐牢。”准备卖船。我把这些情况在杜润生开的座谈会上汇报了。他一听，说赶快写个《送阅件》送中央。万里听说后很恼火：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盟友，不是资产阶级；农村搞什么反自由化。江苏省委发了文件，农村只搞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中央批转采纳，杜老还专门讲了同意江苏省委农工部的意见，全国农村不要搞这个运动。（参见高文斌同志编的杜润生同志言论集。）

那时张家港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市的保税区。费孝通问我：“保税区”是啥意思。我说就是进出口货物许多可以 TaxFree, 建了 FreeTradeZone。他说：“那不是自由贸易区吗？”

我说是啊，但当时对 Free 要避讳啊！他笑，说中国人很聪明，但把我老头子搞糊涂了。他又说，最近提了个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看怎样？我答第四句话太理想主义，现实办不到，似乎改为“和而不同”较好。他莞尔。

尾 声

历史进入 21 世纪了，杜润生同志到了晚年。他在九十岁时有一次讲话跟我们讲了，第一，我们农村的改革，还要进一步过好两个关。一经济市场关，怎么把市场、政府、企业这个关系处理好。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关。就是政治上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的这种民主制度，有政治协商的创新、但许多方面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第二，有两个遗愿。一，中国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毛主席抗日战争时候就讲，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农会，文革时候有一个贫下中农协会，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老是贫下中农，应该组织农民协会。杜老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好，再看三年，跟雇工问题一

样，我们再看三年。但是三年以后，1989年以后，小平同志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建农民协会的任务没有完成。

二，再转移1-2亿农民到城市里去。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这两件事我老杜已经来不及了，要靠锡文、岐山你们这一班年轻人去完成了。“这是我的两个心愿。”他举着我的名片说，这个名片好，只有老吴吴镕四个字，你们不管工作怎么变换，思想不能“农转非”。

他的两个遗愿，进入了21世纪以后，我们也都催促了，但看来建农协的事很渺茫啊！我们根据农村改革元勋杜润生的意思，做了一些农村调查，一次是减轻农民负担的调查，我跟安徽的省人大副主任陆子修同志一起跑了半个月，把苏皖两省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当时把农民的负担呼声叫怨声载道，就这么如实写的。

温家宝同志作了长篇批语，然后开了电话会议，到最后导致了整个农业税都免掉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中央的德政啊！

第二个是农民工问题的调查，农民工问题调查，回良玉副总理、杜青林、陈锡文、何勇他们亲自在农业部听了我们的汇报，我就讲到农民工的苦，包括奥运会搞鸟巢工程，农民工早上带瓶矿泉水带一个馒头，带了尿不湿，上了鸟巢的顶上面去搞钢筋浇筑这些等等。早上6:00去到晚上6:00下来，就靠尿不湿一天在这里，那么辛苦。

后来良玉插了一句话，说农民工实在太苦了，我讲的不好听的话，都是些年轻人连个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一定把你们的调查报告亲手交给锦涛同志跟家宝同志，要专门来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他讲的很激动。后来中央成立了农民工的领导小组，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2013年从春天到秋天，我和老陆商议，聚集了安徽、江苏和广东三省的十多个老干部和学者，开展并完成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百村千户土地制度改革调研项目，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土地改革制度的报告，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上的财产权，要有物权，这个报告可以查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建议，建议送到汪洋同志手里面，汪洋同志批示了，说一些老同志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这些意见很好的，部分的吸收到了中央全会的决议当中去了。

当然了也是很可惜，政策建议送上去不久，陆子修就因为过度疲劳病倒，去世了。我跟他也开玩笑，我说你是滁州书记陆子修，欧阳修也是滁州太守，你政治上要努力超过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有著名的醉翁亭记，文采上不可比，但是在为农民服务方面老陆是做了很多工作，但他2014年已经走掉了，现在也已经走了6年了。

这段尾声作为口述历史说了一些背景情况，我也已经89岁了，奔九了，所以本来不想再多说什么，惠海鸣同志说，你都快90岁了，现在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很多都走掉了，你再不讲的话，有些人对那些情况都不甚了了了。还是抓紧时间要说一说。你像现在吴象同志，虽然是睡在北京医院，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表达很多东西。当时他是领导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朱厚泽和刘堪等等，这些都走掉了。据说谢华同志脑子也不行了。张云天、林子力那么优秀的高人，也都走掉了，当然现在有年轻一代，王岐山陈锡文杜鹰，他们现在也都不小了，不像以前那样在第一线，不可能那样再活跃了。当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周其仁，林毅夫他们，继续在为农民鼓与呼。要记住杜润生老讲的一句话：“你们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或者改了其他的行，但是思想上永远不要农转非，我们要为农民鼓与呼，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总起来说，农村改革，说到底还是还权于农，还权于民。但现在农民还没有价格谈制权，土地制度问

题尚待完善。总之，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农村问题，也“永远在路上”。

大家都称赞八十年代中央5个一号文件写的不错，当时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关于农村方面的文件，我看是有8个文件很重要，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79年中央75号文件，然后82年起5个1号文件，还有一个1984年的关于乡镇企业的4号文件。还有一个1987年的5号文件。5号文件，原来也是1987年的1号文件，86年的时候起草好了，中央也通过了，87年初耀邦同志辞职了。那么前面1234号文件都是反自由化的。农村的事就排到第五号了。所以一共是8个文件。起草文件的时候，我们大体上这样，每年春天二三月份要听耀邦、万里他们出题目，然后杜老就把我们一些人找去，下去分头调查，到四五月份上回来汇报一次，再去调查。

到8月份第二次又回去，那就开始起草了，起草以后，再回来调查，然后11月份到12月份，中央开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比较大的农村工作会议是1981年11月份开的，在北京开，后来京西宾馆有别的事，我们又从北京搬到天津继续开。农民议会，开了半个月，大家争吵包产到户什么，反正农村问题很多，就在那争开了。散会以后，再留下一些人来参加起草。当时好多省都参加过，比如吉林的田雨丰，云南史大姐等多了，经常去的地方上有4个人，他们叫东吴西赵南杜北霍。东吴就是我。西赵也是个江苏人，吴县西山人，四川农委主任赵文新，他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南杜是杜瑞芝，是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北霍是山西省的省委霍泛副书记，他还是个历史学家。

杜瑞芝同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喜欢提意见，有次当了万里的面说，有些事情你们中央感冒了，叫我们下面来吃药。又有一次杜瑞芝跟杜润生讲笑话。当时你不准大家喊杜主任，我从来没喊杜主任，都是喊老杜。但现在我要升格了，我也成为老字号了，我都当了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了，不能再叫我小杜。杜老笑道：你做老杜还不够资格，只要我还在，你永远是小杜。

当时起草文件，其实副主任刘堪是日常主持的。因为杜老会议很多事情很忙，他有的时候就交给刘堪了，慢慢琢磨。那儿高人很多，前面讲到林子力，当时北京理论界的报春鸟。张云先，他改文件很仔细，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细的不得了。如能把原稿档案找出来多好。他是呕心沥血。搞完一次中央文件，就吐一次血，住一次医院。他的爸爸是前水利部副部长。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林毅夫、杜鹰他们，脑子好的不得了，讲数字不要翻本子张嘴就来。

当时我们搞文件，可以说一字千金，很认真。比如说小城镇的问题，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可以到小城镇上去打工。当时文件初稿写的可以自带口粮到小城镇工作。那么人家就问了，你带了50斤背50斤米，已经够重的，挑一担米不容易，吃完了怎么办？大家想来想去，后来国务院研究室当时有一个人叫姬业成，现在也过世了，他说我想了几夜，我想出一个字来了，什么字呢？理，可以自理，我可以买，可以借，可以送，什么都可以，反正我自理就行了。我想说当时搞一号文件一个是调查研究非常深入，一个是文字非常讲究，反复推敲，那是非常认真的。所以5个一号文件经得起推敲。到现在看看还很有味道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有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江苏省委原农村工作部部长、省政协原秘书长。来源：江南时报，2023年12月21日）

不能取消“农民工”的提议

郭书田

最近，看到有人主张取消“农民工”的想法，引起争议，我不同意这个主张，理由是：

第一，农民工这个想法是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没有的，将来会成为词典中的专用术语。目前已基本稳定在3亿左右农民工（每年有近几百万），接近美国人口的总数。

第二，农民工是指农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思想路线指引下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造，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发挥革命性的重大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产物，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第三，农民工的发展与壮大，符合社会学的“抗争规律”。拉的是城市需要劳动力，推的是农村劳动力需要外出转移谋生。

第四，农民工是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转为自带口粮，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两栖农民”（户口在农村，劳动在城市），在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两种户口的户籍制度与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重大突破，是社会进步阶段性的特殊表现。

第五，有关部门宣布，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达65%，这是指包括3亿农民工在内的“常住人口”，如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从此看出，农民工在提高城市化率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六，人口城市化，而农民工未能同步实现市民化，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户口只是身份的变化，而不是国民待遇的一体化。农民工仍处于受歧视的“二等公民”地位。加剧了社会不公的矛盾。“十四五”规划要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拭目以待。

第七，农民工外出打工，赚了辛苦的工钱，已成了2.4亿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早已超过50%。离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依然是“一穷二白”，农业的小户经营富了起来。

第八，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因有承包地，未发生失业的社会危机。美国《时代》杂志专文向农民工致敬。

第九，农民工消失之日，必然是城乡差别消失之时。在此之前，这个想法是消失不了的。

（作者：原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经济师。2024年2月2日）

正确把握“三种关系”

吴协恩

今年以来，我作为人大代表，陆续出席了江阴市两会、无锡市两会、江苏省两会。学习贯彻新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要坚定不移用新思想凝心铸魂，以求真务实精神推动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不懈奋斗。新的一年，要正确把握好“三种关系”：

正确认识“大道”与“小道”的关系

什么是大道？第一、大道就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始终高举旗帜、始终坚定信仰、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绝对不能偏离的大道！第二、大道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共同富裕道路不动摇，这是华西村的根本。第三、大道就是传承发扬华西精神和老书记精神，继续走好华西特色之路。老书记人虽然走了，但神还在，灯没有灭。只要发扬好了这两种精神，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翻身仗”。这三条大道，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不能动摇。

什么是小道？从国家来说，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小道、就是邪路。从华西来说，偏离共同富裕，忘记华西精神和老书记精神，就是小道、就是歧途。从个人来说，不顾大局，只为自己考虑，总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小道、就是偏门。党员干部境界要高、眼光要远、格局要大，要多为大局考虑、多为村庄考虑、多为百姓考虑。做一个合格的华西人，我们不走邪路、不入歧途、不捞偏门，必须举好“永远跟党走”这面旗、走好“共同富裕”这条道、守好“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这一传统。

正确把握“责任”与“担当”的关系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华西的党员干部，绝不能“躺平”，一定要负起责任、挑起担子。具体怎么做，关键弄清三个问题：一是为谁担当？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就是以老百姓为中心，为老百姓担当、为华西村担当。我们要始终忠于组织、忠于集体、忠于百姓。二是怎么担当？担当不是靠说的，是靠做的，重在落实“四敢”精神，“两委”班子成员要放开手脚敢为，党员干部要比学赶超敢闯，各类企业要勇立潮头敢干，村民职工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敢首创。三是担当什么？首先要担当发展大任，前几年为了解决问题，是“减”；今后就是谋求发展，要“增”，要寻求增量、提质增效。最重要的，是担当为民，要齐心协力为老百姓做好服务，像在村民福利、老年人退休金、环境整治等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方面，既要听取多方意见，也要想方设法提升改善。凡事只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多讨论，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后再做决策，华西一定行稳致远。

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的国策。而要实现共同富裕，集体是基础和

保障。作为华西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常讲的：“没有华西村这个集体，也就没有你个人，华西村好了，个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华西村不好，个人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要始终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支撑。

老书记一生，都在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他把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成自己最大的幸福。我们要继承老书记的遗志，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体怎么做？有三条必不可少：

一要精诚团结。首先班子内部要团结，要做到“三个一致”：思想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尤其不能“内耗”，就像老书记生前常讲的“要做战斗的堡垒，而不是在堡垒中战斗！”因为再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只要团结，就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一起来把华西的事情办好。作为党员干部，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国家大道上、用在华西大局上、用在集体事业上，千万不能用在个人利益、个人得失、个人欲望上。华西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个人必须服从集体。我们一定要多考虑一点集体，少考虑一点个人。

二要认真务实。华西的党员群众都说，老书记是“三真三共”：对党真信仰、对事真认真、对人真负责，打造了“共爱”精神、创造了“共有”资产、营造了“共享”氛围。我认为，老书记不仅认真，还很务实。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认真，都需要务实。对于定下的目标，要排出计划、细分到人，按时按点、保质保量认真落实。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要付出更多精力、更多心血，一定要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推进各项工作。

三要主动作为。华西要做的事还很多、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做好攻坚克难的思想准备，不要“等靠要”，要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华西的党员干部，既要严于律己，经常自找不足，更要提振信心、增强干劲，低调务实不张扬，谦虚谨慎不自满，把经济搞上去，把改革抓到底，把内部建设好。我相信，所有干部一块拼，全体村民同心干，华西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华西明天一定更美好！

（作者：华西新市村党委书记。来源：华西月刊，2024年2月8日）

胡耀邦与“包产到户”政策突破

赵树凯

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村改革一马当先，核心是包产到户的政策突破。包产到户政策的突破过程主要有两次：第一次突破，是从一律“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到分两类情况做出规定，即困难地区可以、一般地区不可以；第二次突破，是从不同情况做出规定，即“落后地区包产到户，中间地区联产到劳，先进地区专业承包”，到充分尊重农民选择，一律给予允许。

在这个不寻常的决策过程中，总书记胡耀邦的作用独特而关键。

一、高层决策格局

不言而喻，因为职位所决定，总书记在所有高层重要决策中都是重要角色。但是，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中，具体到农村政策制定，总书记胡耀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却并不容易说清楚。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描述当时的高层决策格局。

万里晚年多次谈到，在农村改革的困难时期，胡耀邦对他的支持至关重要。万里说：“那时问题很多，改革阻力很大，但是，我和耀邦一商量，就呼噜噜干起来。”具体来看，胡耀邦不仅坚定地支持万里，而且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提出、倡导和理论阐述上发挥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作用。

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不同于现在的总书记，当时的总书记，既非名义上党内最高职位，也非实际上最高职位。从名义而言，直到1981年6月，党中央还有主席，即华国锋。从实质上看，中央常委其他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革命资历和政治权威都在胡耀邦之上。因此，总书记在高层权力结构中，并不是做出重大决策的核心人物，而只能说是高层决策过程的中枢型人物。

虽然总书记不是决策核心，但是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却是一个实权机构。同今天的中央书记处也不同，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一线领导机构，是一个独立的高层决策层级。全会决定，“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领导的经常工作机构。”在当时的高层权力架构中，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处于第二线。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位居中央领导第二位的副主席叶剑英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副主席邓小平说，中央书记处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都要管。从实际运行看，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央的党政联席会议，即书记处与国务院的联席会议。从农村政策制定过程来看，当时连续制定并发出五个中央1号文件，除了第二个1号文件，都由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不需要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政治局成员只是圈阅通过。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央书记处权力又是很大的，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权力也是比较大的。

在1980年代上半期，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办公会很少召开，它并不是常规性的，中央书记处的办

公会却密集而规律，通常情况下，中央书记处每周两次办公会，分别是周一、周四，处理决定日常工作。从农村政策制定过程来看，五个中央1号文件，只有第二个即1983年1号文件经过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其余四个1号文件都是书记处讨论通过后，政治局委员圈阅通过。由此可见当时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就是在这样的决策格局下，总书记胡耀邦在包产到户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关键作用。

二、合作之旅

1980年3月初，中央书记处研究工作分工时，胡耀邦推荐万里分管农业，称赞万里是农村改革的“先知先觉”，并表示要给予农村改革更多关注。

万里上任之后的几个月，包产到户在高层遭到一些领导人强烈反对，在外部受到主流媒体激烈批判，包括万里分管的国家农委、农业部等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也在反对，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在安徽，在万里离开后，新的省委第一书记激烈地批判包产到户，给那些包产到户的地县施加了巨大压力。万里陷入苦闷，曾想找胡耀邦长谈。但是，看到胡耀邦十分繁忙，正在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案，又不好意思打扰他。特殊情况下，万里就一大早到办公室，赶在胡耀邦当天的工作议程开始前，与胡耀邦当面交流。历史上万里与胡耀邦没有共事过，私人关系并不密切。书记处成立之初，政务繁多，他们的思想交流机会也并不充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这段时间里几乎陷入沉默。

1980年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一起去西藏，代表中央去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之行，他们两人有了长谈机会。在西藏期间，胡耀邦因为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曾休息数日，很多会议和活动都是万里代表胡耀邦参加。他们两人的思想理念高度一致，不仅在西藏问题上，而且在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清算左倾思想路线、放宽经济政策、突破原有社会主义概念的束缚等重大问题上，两人高度一致，相互唱合。对胡耀邦与万里来说，西藏之行后彼此的理解和默契升华，开启了在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如果说，高层内部还可以有某种盟友关系，那么，对于胡耀邦和万里来说，西藏之行就使他们盟友关系初步奠定。

在赴藏期间，胡耀邦和万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交流甚多。万里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当即表示：“这是当前一件大事，农村可能是整个改革最大的突破口。我想过，但还是忽略了。我对亿万农民心里对包产到户这样迫切，实在不如你摸得透，今后要配合你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西藏之旅后，胡耀邦加大了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

从现有资料来看，从1980年5月到1981年5月，即从西藏回来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胡耀邦倾注大量精力解决农村问题。1981年5月16日，因为河北发生旱情，胡耀邦召集三位农委工作人员座谈，听到了城市和工业部门不适应农村改革的情况，尤其是商业部门成为改革的“梗阻”。胡耀邦表示，前一段主要关注农村本身，但农产品流通、工业品下乡、政府管理不适应等很多问题要从城市入手解决，下一步他要更多关注城市问题。

西藏之旅也是胡耀邦和万里的共患难之旅。在西藏期间，胡耀邦和万里对于西藏问题提出了系列新看法新思路，包括西藏的行政体制、农业政策、民族政策、援藏政策等，特别是提出西藏充分自治，破除左倾思想路线障碍，经济上采取一切办法放宽搞活，并且提出大规模撤回汉族干部等。这些新的思路，在万里代表胡耀邦主持一系列座谈会和内部讲话中基本形成，集中表现在1980年5月28日胡耀邦在西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但是，他们回到北京，遭到强烈批评。在一些人看来，按照他们的思

路来办要出大问题。这些新的政策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实施，而且遭受了长期指责。因为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实施，所以无从判断这些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因为这次活动，胡耀邦和万里一起经受了巨大压力。对于胡耀邦来说，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受到多次责难，而且逐渐升级，1980年西藏之行可称为第一次。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

三、突破两个“不许”

1980年5月31日，胡耀邦、万里结束十天的西藏之行，回到北京。同一天，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汇报中，谈了包产到户问题。这就是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那篇著名谈话《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这个谈话称赞了肥西的包产到户、凤阳的包干到户具有良好效果，并指出“不必担心”。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谈话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就是那些适合包产到户的困难地方，并强调搞了包产到户也还是以生产队为主导，集体经济是方向。

在万里与胡耀邦的意见交流中，万里建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因为解决包产到户问题，关键是省委一把手的态度。为了使会议取得好的效果，他们商定先分头去有关省做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七八月间，胡耀邦去了西北，万里去了东北。虽然胡耀邦、万里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多数省委第一书记仍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因此，在9月份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即所谓“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会后，胡耀邦主持，以会议纪要形式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即著名的75号文件。与此前的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相比，这个文件有巨大进步，即第一次正式允许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谈到1980年75号文件，在很多农村改革历程回忆中，往往认为这个文件为包产到户开了口子，并津津乐道于文件中“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的遣词之妙，而不提“可以，也可以”是有限定的，即强调困难地区“可以，也可以”，而一般地区不可以。尤其是，这个文件在政治理论上对于包产到户依然坚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还在继续肯定人民公社体制，肯定多数地方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好的。因此，这个文件所开的政策口子是有限的，而且对包产到户设置了明确严格的条件限定，即只能在贫苦落后的“三靠地区”（“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但实际上，当75号文件出台时，安徽等地的包产到户范围已经比较广泛，远远超越贫困地区。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的政策规定一出台，就已经落在了现实后面。万里对于这个文件很不满意，认为这个文件仍然有很多左的框框，表示很着急。胡耀邦曾劝他：“有进步就好，着急也要慢慢来”。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万里分管农业后主持起草的第一个农村工作文件。这个文件是政治妥协的结果。任何重大决策的形成，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依托于一两个领导人的主张，更不是依靠个别政策研究人员和起草人的主张。万里多次表示，75号文件起草过程很是艰难，是个不得已的妥协。因为这个文件的妥协性和局限性，进入1981年时，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思路争端更加复杂。

四、整顿农业部门

从1979年初开始，万里还在安徽主政时，就对国家农委、农业部等有诸多不满。1980年2月万里进入中央领导层后，因为农业部门有些负责人继续批评抵制包产到户，万里的这种不满进一步增加。但是，在主管农业的一年内，万里并没有直接表达这种不满，而是采取了隐而不发的态度。

差不多分管农业一年后，即1981年初开始，万里的不满终于爆发，开始了对农业系统的清算整顿。

1月6日，国家农委传达了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的话：“反对包产到户，是和三中全会精神对着干，思想不通可以，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领导岗位。”3月1日，万里主持了农业部党组会，对农业部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指名道姓，措辞尖刻强硬；3月11日，万里主持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农委、农业部等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检讨。万里对农口干部的批评，有些话相当尖刻，如说“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欢天喜地，你们倒是忧心忡忡”，“只知道坐在大楼里指手画脚，只知道念那本大寨经，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甚至说“农业部是左的路线的顽固堡垒”。万里要求，农口部门的部级、局级干部要深入农村搞两个月调研，去看看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农口系统的大调查由此开始。7月18日，万里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听取国家农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部门负责人下乡调查汇报。

1981年上半年万里主持的农口思想整顿，主要是针对75号文件的历史局限。在万里看来，1980年75号文件限制了包产到户推进。万里在多个场合指出，这个文件早已经被农民的实践突破，不适合农村情况，而且，文件中还有不少左的东西，被反对推进农村改革的思想所利用。

为什么万里在进入中央领导层一年后，才对农口系统进行思想整顿？主要原因是高层政治格局或背景的变化，其中关键性因素，是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1980年12月5日，在经受了连续八次的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后，华国锋提出辞职，并要求即日起不再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的工作。胡耀邦由此开始接替华国锋主持政治局工作。万里所以能在农口开展组织思想路线方面的清理整顿，包括一定程度的干部调整，最直接有力的支持来自胡耀邦。

五、突破“切三刀”

对一般人而言，1982年1号文件的主要贡献是突破了1980年75号文件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局限和理论否定，但人们所知不多的是，1号文件更具针对性的突破，是突破包产到户“切三刀”的限定，这是高层内部另一种政策思路纷争。

“切三刀”是当时农口部门的流行说法。其政策含义是，落后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即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1981年1月中旬，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随总理赵紫阳外出调查回来，提交了《关于农业政策一些问题的意见》报告，中央办公厅于3月27日转发全党。杜润生在报告中认为，中间地区和发达地区不适合包产到户，提出：“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得不算好，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这个报告认为，适合包产到户的农村有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人口，占农村人口的25%左右。

在“切三刀”政策主张提出初期，万里没有公开明确表态，但在内部表示了不赞成。6月，万里安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广友写了内参文章，随后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内参文章明确表示，不应该用“切三刀”政策限制农民，而应该由农民自己选择采用哪种责任制形式。

在关于“切三刀”的政策意见分歧中，胡耀邦支持了万里，成为万里抵制“切三刀”的坚定支持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这个意见分歧过程中，具有更高政治权威的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没有发表意见，似乎置身事外。万里晚年在回忆农村改革进程时，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进入1981年7月末，制定新文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年初先是在农业系统开展了思想整顿，政府

内部从政治上反对包产到户的力量被遏制，不再成为主要威胁，同时，随着各地包产到户的迅速扩展，出现了“大包干统一中国”的势头，原来赵紫阳、杜润生设想只在 25%左右的困难地区，已经被现实情况远远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新文件的条件显然成熟了。

早在 1981 年 5 月，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他直截了当地说：“合作化搞早了，人民公社本来就不该搞”。胡耀邦的这个论断，在今天已经属于常识，但在当时则超前而且大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先声夺人，可谓振聋发聩。一年半以后，即 1982 年秋天，高层部署起草关于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文件。又经过将近一年研究讨论，这个文件于 1983 年 10 月发出。在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这个问题上，胡耀邦和万里都是发改革先声的领导者，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政策和理论研究界。

为了突破 75 号文件，包括突破“切三刀”的政策设计，需要制定新的中央文件。制定新文件的正式提议，是总书记胡耀邦提出的。1981 年 7 月 31 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 8 月 4 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文件起草工作在万里领导下进行，国家农委具体承担起草任务，杜润生是起草负责人。当年十月份，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个月。会议开始时，万里讲话，谈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并对三年来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要求大家讨论会议提供的文件草稿。会议之前，1981 年 10 月 20 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文件稿；会议结束后，12 月 21 日，中央书记处又讨论了根据会议修改的文件稿。文件没有安排进入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是采取政治局委员圈阅的方式最后审定。当所有程序结束时，已经进入年末，作为 1981 年文件已经来不及，于是作为 1982 年一号文件发出。因为作为 1 号文件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启发了胡耀邦，他决定以后每年发一个中央 1 号文件。

第一个 1 号文件出台，从高层决策流程来看，是万里和胡耀邦合作的结果。在正式政策议程中，胡耀邦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与万里沟通的结果。显然，作为总书记、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建议搞一个新的中央文件，比作为分管领导人的万里提出来更加有分量。这可以说是胡耀邦对万里的支持，也可以说是两个人的密切合作。晚年万里曾多次谈及与胡耀邦的密切关系。胡耀邦与万里的相互支持和默契配合，贯穿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农村改革进程。1987 年 1 月胡耀邦去职，万里倍感“唇亡齿寒”。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中国改革》2018 年第 2 期）

实施中国食药促进会九大品牌建设

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率先召开工作推进会

谢久忠

2月27日，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食药促进会会长毛振宾院士在促进会2024年新春第一会上提出的发展战略及顶层设计“13369999工程”的总体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九大品牌建设工程，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紧跟促进会步伐，不负春光，率先在农业农村部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成果体验馆会议室，召开品牌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议由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新望同志和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建设负责人、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兆荣同志主持。根据促进会各分支机构行业细分领域性质，聚集整合的业务创新板块，融媒体与直播工作委员会刘陶、质量评价与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委员会吴美萱、品质消费与营商环境工作委员会税晶、投融资服务分会苏添真等分支机构主任委员，以及相关食品行业部门和机构的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胡兆荣主任介绍了三农工作委员会在推动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建设中要发挥的作用：一是中农科汇（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发起成立了三农工作委员会，要联系和沟通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及事业单位，全国农业农村系统相关单位、机构，形成上下联动，把三农工作委员会的事业做大做强，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二是要以起步就要加速的姿态，筹备举办“2024中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大会”，而且围绕诸如化橘红、绞股蓝、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争取每月或每季度召开一次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及小型论坛活动；三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农业网络电视的资源，建设好视频号、抖音号、今日头条和公众号等主流媒体为全国涉农企业和涉药企业以及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刘陶主任委员在发言中表示，融媒体与直播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我们的工作就进入了“快车道”，发展势头明显向好。工作委员会先后与河南、延安、黄冈等十几个省市和地区商业厅合作，号召本地网红主播参加“三农”产品直播带货，帮助农民把农副产品、库存产品推出去，截止目前已经举办了30多场活动，最好的收效为每场次实现营收3000余万，直接为涉农企业或农户带来了明显的收益。通过本次会议，我们要与三农工作委员会加强沟通与协作，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与大健康的品牌建设。吴美萱主任委员说，质量评价与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委员会主要是配合公安机关等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三品一械”领域及地标产品抽检和评价，充分运用基因等检测技术保证产品质量，包括目前，正在加紧落实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千品千检”项目。税晶主任委员表示，我们工作委员会去年在成都成功地承办了县域民生经济博览会，2024年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将大会办得更具针对性和目标性，同时基于科学和美好愿景，我们已筹备和启动了“2024营养健康传播大赛”。苏添真主任委员表示投融资服务分会的职能，就是对接政府和企业为“三品一械”

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助力，形成促进会品牌建设的有力支撑。参会的相关领导专家提出，促进会推进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建设，要加强农产品的标准化工作，真正做到以标准管质量。

从春天出发，一刻也不耽误。本次会议，大家在“头脑风暴”中解放思想、激发灵感、理清思路；在集思广益中想办法、寻突破、找准路径，推动发展，凝聚起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和团结奋斗、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真正把推动乡村振兴与大健康品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作者：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2024年2月27日）

我有一个中国梦“千万工程”容我报

孙鸿良 岳绍先

(一)

我有一个中国梦，种苜绿色一体化；
草业革命早来到⁽¹⁾，草丰节粮牛羊壮⁽²⁾。
生态资产有保护⁽³⁾，草地农业建奇功⁽⁴⁾；
农业强国待建设，扶贫到位出新貌。

(二)

我有一个中国梦，人工草地建设好；
千里草原曾考察，高耗种草成功少^(附图1)。
只因未对生态位，杯水车薪难见效^(附件1)；
“千万工程”有指引，生态转型就可报⁽⁵⁾。

(三)

我有一个中国梦，种苜扶贫能持久；
40载春秋育新种，卅年退休笔耕忙。
40篇论文已问世，创新转型技术全；
更有企业来相助，草高质优持续化^(附图2)。

(四)

我有一个中国梦，种苜自产蛋白源⁽⁶⁾；
喂畜不比苜蓿差，何必再靠进口料。
十年实践有证明，国家有证来依托⁽⁷⁾；
只盼国家来主持，扶贫不返有保障。

(五)

我有一个中国梦，种苜改土效果好⁽⁸⁾；
旱地盐地能适应⁽⁹⁾，节水节粮有奇效。
不再依靠进口料，自身解决投资少⁽¹⁰⁾；
更含名贵角鲨烯⁽¹¹⁾，防衰保健食用好⁽¹²⁾。

(六)

我有一个中国梦，只待转型见奇效；
生态文明同建设⁽¹³⁾，绿色发展能持续。
种苜播量还奇低，增产节粮可双赢⁽¹⁴⁾；
何不将此作试点^(附表1)，千秋万代节节高⁽¹⁵⁾。

与前文有关的经研发证实了的由作者等撰写的部分参考文献

1. 孙鸿良 岳绍先 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在籽粒苋草产业蓬勃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发表 30 周年《中国种业》2015 年第 3 期：9-12 22-25
2. 孙鸿良 岳绍先 崔巍等 籽粒苋草产业给贫困山区带来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效益与展望《饲料科技与经济》2014 年第 4 期：084-086 26-28
3. 孙鸿良 草地生态资产受损致因及重建新模式的探讨《草业学报》第 13 卷 5 期，2004 年 10 月 1-5
4. 孙鸿良 内蒙古中西部草地整治与建立节水型饲料作物基地探讨《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第 13 卷 3 期，2005 年 7 月：6-9 页
5. 孙鸿良 我国北方地区扩大林草面积的成功模式及其纳入草地生态农业体系的生态学依据《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第 17 卷 4 期，2009 年 7 月：807-810
6. 卢洪华 孙鸿良 岳绍先 籽粒苋作为蛋白质饲料源的前景《中国种业》2023 年第 6 期 74 页
7. 国家科委于 1992 年授予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粮饲兼用作物籽粒苋高产栽培模式及综合利用的技术依托单位”证书
8. 孙鸿良 陈幼春 创新技术带来籽粒苋优质青饲料面世《中国畜牧业》2016 年第 24 期：47-49
9. 初克森 孙鸿良 在半荒漠地区复垦地上种植籽粒苋是开辟蛋白质饲料的途径之一，中国管理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通讯》2023 年第 4 期
10. 孙鸿良 籽粒苋优质干草终于以高产出、低成本的姿势进入市场，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所《通讯》2020 第 10 期（总 370 期）26-27
11. 孙鸿良 岳绍先 苋籽油中角鲨烯（Squalene）与苋干草综合开发的前景分析《中国种业》2021 年第 3 期：19-21 页
12. 董文彦 孙鸿良等 籽粒苋延缓衰老作用的研究《中国粮油学报》1999 年 14 卷 16 期：41-44
13. 孙鸿良 齐晔 从生态农业到生态文明——纪念马世骏先生诞辰 100 周年暨生态工程理念发表 36 周年《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7 年第 25 卷第 1 期：8-11, 139-143
14. 孙鸿良 岳绍先 籽粒苋饲料喂饲畜禽的增产节粮双赢的现象及其营养功能效应《中国畜牧业》2019 年第 21 期：29-31
15. 孙鸿良 他对籽粒苋事业发展前景早有论断——纪念于光远《它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发表 23 周年：《中国循环经济》2013 年第 6 期：33-38

附图 1:



图 1-1 此图为内蒙古年降水量 400mm 牧区锡林浩特奶牛场的“万亩饲料地”，这里是一片 4000 亩的作饲料的青谷子试验地，需多次灌溉才能生长，而且每亩仅产青干草一吨，每亩投入成本高达 600 元，这种得不偿失说明生态位不对口所致 2001.8.24



图 1-2 此为年降水量 450mm 的草原区化德市的“环北沙源治理工程”项目区，此村已退耕 3000 亩低产种粮田改种柠条养牛兼防风固沙。附近有一井，曾投资 3 万元建立井灌系统，每小时仅出水 30-50 吨，成为杯水车薪之举，未能达到要求 2001.8.21



图 1-3 此图为正蓝旗白音乌伦戈牧区的“节水高产饲料示范地”——500 亩青玉米地，要求每亩产玉米青饲料 5000 公斤，实际上喷灌水次数至少 6-7 次，还未能达到抗旱需求，而且 8 月底-9 月初就得收割以免下霜冻害，所以产量更难以提高，可见寻找既耐旱又高产的优质人工饲料种群替代以对准生态位为当务之急 2001.8.23



图 1-4 此为内蒙古锡林格勒盟牧区的“万亩节水灌溉饲料地”装置为奥在利生产的 TX50/125 型转盘式喷灌机为井位，井深 80-100 米，出水量 50 吨/时，土质为沙性栗钙土，以种披碱草，老芒麦牧草为主。由于去年未灌水牧草长不好，且一块块的空斑化，仅约生产干草 75 公斤/亩。当时我国北方天然草地中人工草地约占 0.5%，要求达到 2-3% 就可缓解当时人工饲料严重不足问题 2001.8.24



图 1-5 图为年降水量 360mm 的牧区内蒙锡林格勒盟正蓝旗白音乌伦嘎查的青玉米饲料地，正用管道移动机械灌水。此田已灌 6 次水，每次 90 方，要求亩产 5000 公斤青玉米未能达到，而且蛋白质含量低。这种饲用结果使牛头数正在下降（例如正蓝旗原有 110 万头牛羊年调查时已降至 80 万头，其中奶牛下降至 3 万头）200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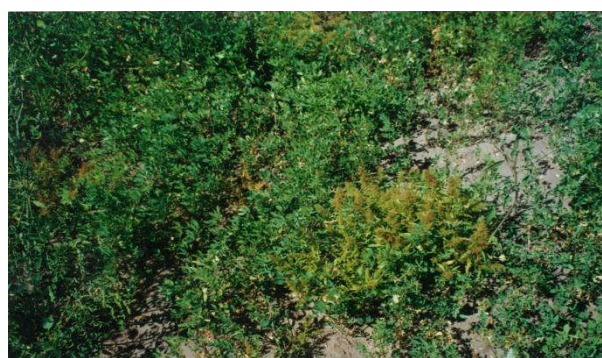


图 1-6 内蒙古锡林浩特牧区草原“节水增效灌溉示范区”共 4000 亩，位于布勒特苏木境内，要求鲜草比天然草场亩产多产 5000 公斤。图为紫花苜蓿灌溉草场，需多次灌溉，“干了就灌”，约每 10 天灌一次，投入太多，苜蓿虽产 5000 公斤/亩，但表现高耗现象，很难大面积推广 2001.8.25

附图 2:



图 2-1 图为中煤节能公司在内蒙古半荒漠的库布齐沙地三年复垦地上种植的籽粒苋成功，只灌两次水，可达 1.8 米高，而附近同天种植的春小麦等不出苗（左），即使稀疏出苗也十分低矮，苋在这里还正常开花结实。苋籽的营养价值很高，可作饲料也可作粮用。1960 年东非大旱时，曾有外国医生在那里发现当地居民并没有营养不良现状，原因是食用了抗旱的营养价值又高的苋籽 2007.9.21



图 2-2 图为和谐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企业家在农区湖北省宜昌市种植的红苋 K472，在出苗后 2 个月半月，就可形成一片密林状，高达 4 米以上，不仅单产提高不倒伏（苋青干饲料的单产可达 20-30 吨/亩），而且蛋白质也大为提高含量可达 23-25%，使该地区养牛不仅不用补饲苜蓿或豆粕，而且节省补饲玉米粒 1/3，并使牛提前一个月出栏，所以节省了粮食补饲量又开发了欣欣向荣的农村经济 2023.9.13



图 2-3 由于籽粒苋抗旱在我国半荒漠地带的兰州永登地区种植成功，其只灌溉 1-2 次水，可收整株青饲料 5000 公斤以上，或收苋籽则在 100 公斤/亩以上。而如果种苜蓿或青玉米则需灌水 5-7 次以上，且产量要低得多 2002.9



图 2-4 图为在山西省五台山乱石沟内种植的引进品种（红苋 M7）籽粒苋，籽粒苋具高产、高质量（蛋白质、赖氨酸、角鲨烯皆高），抗逆性强（耐旱、耐盐碱土地、耐土壤贫瘠）与播种量低（每亩播量仅 8 克）四大优点。经我们 40 年的定向培育与运用生态工程技术种植后生产力更高，一般是苜蓿、青玉米的 5-15 倍。



图 2-5 在年降水量仅 50mm 的荒漠区的新疆巴洲博湖县塔乡灵峰家庭农场用洗盐水灌溉地（共灌 3 次水，施尿素 2 次），种红苋 K112 成功，平均高度 2.3 米，证实了苋不仅耐旱，还在一定程度上耐涝而且耐盐（pH 在 10.5 以下，含盐量在 0.3% 以下）。他家在 2023 年共种苋 100 亩拟喂养毛驴 1500 只，以取代蛋白质营养，可不再依靠进口豆粕或苜蓿 2017.9



图 2-6 山西省忻州市半农半牧区的五台山石山沟内由于种苋养羊成功，2013 年邀请 14 个县的正副县长及养羊企业家 200 多人来参观调查，在乱石山沟苋产地及加工与饲羊节粮等情况。图为车队经过干石山坡的无法灌水的旱石坡旁（右）也可见到旱作种苋成功的苋田 2013.10.12

附件 1:

作者之一为 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生态学副博士生，有一种责任感使我眼见北方草地因过牧生态资源严重退化状况，以及北方畜牧业所饲用的蛋白饲料来源匮乏，不得不日益依靠进口苜蓿与豆类来维持的形势；再据笔者 2000-2002 年亲自参与了由钱正英院士主持的“西北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改善与可持续发展”重大项目，实地进行了当时作为补充方案的人工草地建立的考察，**当时就发现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如只靠多次灌溉才能获得微弱苜蓿、青玉米等产量来解决如同杯水车薪，缓解不了人工草群增喂的现实要求，更不具有饲料中蛋白质的有可能含量提高而减少依靠进口苜蓿与大豆等的效能。**据我国多年依靠进口来缓解并历次增加，例如 2012 年进口大豆 58.38 万吨，2017 年上升至 952.63 万吨，2023 年仅向美国就进口大豆竟达 9941 万吨，粮食进口超过 1.6 亿吨，并首次向南非进口大豆，数量与价格皆为上升趋势。

据此，笔者曾以 40 年前从美国茹德尔有机农业中心引进籽粒苋优良杂交种又对其培育研发新品种撰写的 40 篇论文，提出必须改变人工草地主体草种问题，**提出生态系统中部分以籽粒苋来取代主体生态位做法，也就是必须与自然条件协调而进行种群生态结构转型，才能出现高效低耗的新面貌。**在此期间有关企业家的参与已纷纷作出了有力的实践证明，2023 年种植示范田万亩以上，可供参观调查（附表 1）。如建立家庭牧场，种苋恰能完美地助力养畜又能改善生态环境。为保护生态资产，种苋与绿色发展结合还是促进养殖业发展，很快与生态文明建设接轨的途径之一，所以种苋绿化一体化是当今必由之路，而且可持续发展。如再纳入“千万工程”建设则生态经济效益将更高增加。

据此，虽然我们已有充分的试验证据证明了以籽粒苋充实人工草地生态位有节能节粮的双赢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缺乏蛋白饲料来源的困境，又能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地区畜牧业发展，今如还能与国家“千万工程”计划结合起来而纳入国家大规模开辟低碳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结合的轨道，则后果辉煌，不胜期待！

附表 1:

由和谐城镇化建设公司企业家个体于 2023 年种苜养牛的实况
(用以证实种苜养牛不仅可喂畜节粮 1/3, 而且不必依赖专供的蛋白饲料)
(2023 年 6-10 月)

序号	地点	种苜面积 (亩)	苜青饲料产量 吨/亩(平均)	鲜草中粗蛋白含量	有无灌水	施肥
1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	2100	21	制成配合饲料后 含 12%	未灌	有机肥 2 方/亩
2	湖北省钟祥市	6500	16	未测	未灌	有机肥 2 方/亩
3	广西百色地区田东县	6150	12	鲜茎叶 25.8%	未灌	有机肥 2 方/亩
4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	100	8	未测	未灌	有机肥 2 方/亩
5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	50	9	未测	地区多雨 曾被洪水淹过 一周无大碍	有机肥 2 方/亩
6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200	26.5	未测	地区少雨 灌 3 次水	有机肥 2 方/亩

1、制青贮时掺和 50%的老玉米秸秆碎片, 此时整个青饲料含水量约 45%左右, 入窖后至发酵 50 天即可喂用。

2、在农区同一地点如种青玉米饲料一般每亩产量只产 3-4 吨, 上表可看出如种苜每亩可多产 5-15 吨, 如出售青饲料每亩可获 1-1.5 万元。

3、在辽宁阜新市彰武县过去种青贮玉米与苜蓿喂羊成功, 2023 年则种苜 50 亩, 将苜青料与青玉米分别按 60%、40%混合入窖, 发酵喂羊效果极好, 可替代补饲苜蓿与豆粕, 并降低总体成本 15%, 与节省粮食饲料 30%以上

4、广西百色地区田东县农户有养牛的传统, 但近年因缺乏蛋白饲料来源而举步维艰, 2022 年开始试种籽粒苜, 3 个月可获得亩产 8-15 吨的青鲜饲料(一年可种两茬), 而其干物质中粗蛋白含量可接近紫花苜蓿水平而可替代苜蓿或豆粕。实践证明, 每亩一季苜的青饲料产量可不另喂饲豆粕喂两头牛, 而且可使牛提前一个月出栏。仅扣除提前一个月出栏节约的饲料费, 则每头牛比常规饲料喂养净收入可多 3000 元以上。

一号文件里的“三农”脉动

仲农平

近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主题为：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持续对“三农”工作进行擘画。

在这12个一号文件里，始终贯穿了重农强农惠农富农的主线。在政策创设上，既有一以贯之的守正，例如2013年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例如2019年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既有针对阶段性情况的应对之策，例如2017年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打基础管长远的战略规划，例如2018年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同时，这12个文件既始终观照“三农”的整体、长远和根本，又精准针对“三农”的局部、眼前和具体，既有对国家大局“保供”的念兹在兹，也有对农村民生福利、农民增收的“时时放心不下”，是“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一以贯之扛在肩上，是毫不放松抓粮保供“首要任务”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心任务”的始终如一抓在手上，十分具有系统性、前瞻性、针对性、精准性和民生性，可以称得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施工图和说明书。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框架性的顶层设计。从此，围绕这一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7年的一号文件中，除了脱贫攻坚决胜期立足阶段性任务、补足短板中的短板，其他都在主题中聚焦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

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从2004年至今，本世纪已经有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观察，特别是从这些政策文件中，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怎样影响着“三农”，以及“三农”又对宏观大势作出怎样坚如磐石而又不为人察觉的支撑与贡献，从中可以管窥“三农”的历史脉动和政策的匠心独运。

粮食政策与三次全球粮食危机

在现代社会，“三农”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越来越与外部大势紧密相连，联结越紧密，外部性就越强，受宏观经济形势、地方发展驱动、社会治理结构以及国内外合作与博弈等的影响也就越大。

在这一点上，粮食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供，保供的首要任务是保粮食安全。在这些年的一号文件中，粮食政策十分稳定，目标始终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特征，“运筹之手”也相应地在“手法”上予以调适。

而2014年可能是这二十多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粮食政策的一个节点，文件中再次强调并阐释了201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一锤定音奠定了新时代重农抓粮的主基调，一直延续至今。

让我们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回顾，沿着时间线来看一号文件中的粮食政策与背景。

2004年面临的情况是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下滑了5年，而且速度很快、幅度很大。在1996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0000亿斤大关后，从1999年开始下滑，到2003年只有8614亿斤。

而且从结构上分析，这种形势更加严峻。粮食产量从上世纪80年代迈上7000亿斤台阶，之后的几次千亿级跨越，据专家分析主要与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等突破性品种以及化肥等技术推广，单产快速提高有关。但在本世纪初的连续5年下滑中，主要因素却是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据统计，1998年粮食播种面积11379万公顷，到2003年仅为9941万公顷。

靠科技提高单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大方向，但急不来。而种粮面积的下降却如此之快，背后涉及一些地方政府的占地冲动、产粮大县和种粮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出手强力纠偏。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第一章就首先明确“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并提出一系列解决办法。而正是从2004年开始，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获得大丰收；2005年在丰收基础上继续增产，总产量已经接近万亿斤高点，达到9680亿斤。

值得一提的是，次年我们就遭遇本世纪第一次全球性粮食危机，而在此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重回万亿斤台阶，有效防御了外部冲击。

第二次全球粮食危机发生在2010年前后，而此前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写入主题，对粮食的重视也转化为现实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产量持续上涨，2011年迈上11000亿斤台阶。这期间，粮食的稳定发展为我们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不过，平稳度过粮食危机后，连年丰收伴随的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对此予以理性考量是必要的，但一些地方的思考却慢慢“变味”，甚至出现“粮食是不是太多了”的疑问，一时众说纷纭，杂音频现。

针对这样的疑虑，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这个“首要任务”，2014年一号文件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在第一章第一节突出强调。

而这些年里，国际粮食市场并不太平，来来回回在“贵了贱了、多了少了”之间拉锯，我们能顶住双向冲击，就是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科学性的最好验证。如今回头来看，如果我们紧随那些头脑发热的“杂音”，在政策创设上对粮食安全有所松动，那在面对后来国际高强度博弈和复杂地缘矛盾、面对极端气候频发重发、面对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情况，我们还能有今日的游刃有余和坚定从容吗？

2015年前后，国际粮价持续走低，一时间国内出现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怪象。这个阶段一号文件在粮食政策中体现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中“放”的理念。例如要“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际粮价低迷时，可以“适度进口”；再如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轮作休耕”——库存量足够，可以让资源环境绷得过紧的弦放松休养一下。

不过有一点要清醒地看到，“放”是有选择地“放”、有条件地“放”、有能力地“放”，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越是在“放”的同时，“收”的部分反而是收得更紧了。这个阶段的一号文件同时反复强调“口粮绝对安全”，在中央文件里，罕有“绝对”这样的表述方式，但是在口粮安全上，我们强调的就是“绝对”。

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粮食政策中所蕴含的哲学理念：抓主要矛盾，关键口粮要掌握在自己

手里，结构性调节品种可以统筹用好两个市场；看变化趋势，遇到波折要树立自信，居安时又要思危。

事物发展变化如此之快，那些年主张粮食多了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短短几年时间国内外粮食市场就发生逆转，国际粮价迅速回升；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紧接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发生了本世纪第三次全球粮食危机，多个国家甚至出现限制粮食出口的“国家级囤粮”现象。

事实再一次作出检验、给出答案。近三年的一号文件仍然把粮食问题放在第一章去讲，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也将是未来不可动摇的国策。

现代文明为“三农”注入新动力

“三农”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现代化进程也为传统“三农”注入新动力，激活新业态。这一点在农产品流通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进一步加强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建设”；2006年提出“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

——本世纪初，农产品市场流通机制仍要继续巩固，同时批发市场也逐渐走向升级。这背后是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从统购统销到市场经营，从农民提篮叫卖到批发市场红火的发展背景。

2008年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大市场、大流通”；2010年提出“统筹制定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规划”“发展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2014年提出“加快制定全国农产品市场发展规划”。

——农产品产销开始着眼全国进行布局，“南菜北运”“买全国卖全国”的大流通格局逐渐形成。这背后依托的是举世瞩目的公路建设速度。据统计，1999年末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刚刚突破1万公里；2007年底“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基本贯通；而到2013年底，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经突破10万公里大关。

2017年一号文件将“推进农村电商发展”作为单独一节，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等；2023年提出“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2024年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一号文件就提到“电子商务”，但农产品上行真正发展起来还是最近几年的事。互联网时代依靠电脑上网，设备贵、上网费用高、电脑使用还有门槛，据统计，2005年底我国网民人数1.11亿，其中82.6%是城市网民，农村网民只占17.4%，城乡出现“数字鸿沟”；不过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农村居民特别是年轻群体，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台，随着网购、直播、社交平台的兴起，手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具”“新工具”“新玩具”。这背后离不开通信技术、手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农村宽带的广泛普及，是一个系统的科技保障体系在发挥作用。

类似的还有农业保险，2004年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到2009年已经是“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2014年一号文件中，“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作为单独一节出现，对保费补贴比例、保险品种、风险管理等进行细化部署；而到了2024年，更是提出“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

农业保险从无到有，从“保灾害”“保成本”“保大宗”到“保价格”“保收入”“保特色”，其脉络轨迹都写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同时也写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财政支农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的产业化中。

现象级事件背后的“三农”贡献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关于“三农”对大局的支撑作用和底座意义，其实已经说过很多了，不过本文还是想从城乡关系、央地关系的角度，再次回顾这些年来“三农”与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导向性、驱动性重大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世纪以来“三农”领域几次显著现象都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里留下了印迹。

2010年，“乡镇企业”这个概念最后一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一诞生于改革开放的两个“意想不到”之一的现象逐渐完成历史使命。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一号文件曾提出，乡镇企业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这些要求也许预示着后来的历史轨迹。

同样是2004年，农民工跨省大潮正在兴起，当年一号文件还在为农民工正名：“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到2009年前后，全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3亿，不过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据统计有2000万农民工被波及。当年一号文件也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2013年，随着城镇化进程，一号文件提出要“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始提出“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到如今，全国农民工总量虽然还在增长，已经接近3亿人，但是大规模跨省流动的占比正在下降，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本地农民工比例正在提高。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农村实现宜居宜业，正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让我们还是把思绪回到2004年，当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一方面针对农民增收缓慢，另一方面仍是着眼于自上世纪末开始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之前，一些地方将农村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缺口通过税、费、工等形式压到农民身上，而且越是粮食主产区、越是种粮农民，负担越重。一号文件提出“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接续提出“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标志着2600年“以农养政”历史的终结。

本世纪初，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性越来越高，甚至被称为“土地财政”。土地出让收入来源于农地，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头却用于城市建设，形成了事实上的“农村支援城市”。那些年的一号文件中不断要求，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要“加大比重”，要“明显高于上年”，要“大幅度提高”。党的十八大以后，历年一号文件对此也是反复强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2020年出台《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末，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2021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制定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考核办法”，在这些“硬杠杠”约束下，土地出让收入“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的情况逐渐缓解。

而分析这些现象级事件，首先当然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因素，其次要放在国家宏观背景中去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驱动和行为逻辑。

直白地说，那些年里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出于“GDP冲动”，或者为了财政税收有意或无意地“重城轻农”“扬工抑农”，而“三农”或显性或隐性地为地方发展作出了牺牲。

如今回过头来看，从乡镇企业到农民工大潮，从农民负担过重到土地出让金用途调整，在这些现象级事件中不难看出“三农”的负重前行和历史性贡献。算产值，第一产业占比逐年下降，在有些发达地区已经低至个位数，但农产品保供、优质廉价劳动力，这些，从数字上能体现出其真正价值吗？算分配，这些年给农民的补贴确实在逐年上升，但与那些历史阶段的农民负担和土地出让收益相比，我们是在还

历史的欠账。

农民的牺牲难以统计，农民的贡献无与伦比，中国粮安靠农民，中国制造靠农民，中国复兴有农民，国运昌隆，最该谢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这是领袖对农民的深情，这是国家对农民的承诺，这也是历史天平称出来的大公至平！

乡村振兴是为农民而兴

如果从全方位的视角观察某个阶段的经济社会整体，我们会发现，其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抽丝剥茧最后找到的关键往往都指向“三农”；而如果把“三农”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看，也会发现，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矛盾，本质上大都是“三农”问题与其他矛盾的叠加。

“三农”如此重要，但她同时也是被索取的一方，而且这种索取往往不容易被察觉。就像当年人们很容易把农民工工资等同于劳动力价值，而天然地将其养老、社保、子女养育成本甩给乡村一样；也像当年让农民自己缴费养自己的教育、卫生，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一样，现在类似的错觉也并未绝迹，“三农”的价值也依然常被一些人低估。

向“三农”索取往往是天然的、潜在的、不自知的，所以，向“三农”倾斜也就必须强力性的、纠偏性的、还账性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堪堪达到平衡。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三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对“三农”的重视和支持不断踏上新台阶，攀上新高度。

党的十九大以来，从2018年至今的一号文件中，乡村振兴是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也要“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最强音。

关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也已经谈过很多了。说一千道一万，最本质的一点是，乡村振兴是为农民而兴。她当然同时会促进农业保供、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也会开辟新的消费市场，但这都是客观效果，乡村振兴主观上的根本目的还是为农民本身、为农村自己：让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农业强起来就是最根本的目的，用一句话说就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乡村振兴真正的价值，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最好体现。

2024年一号文件，在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一种方法论写进主题。“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已经成为涵盖乡村振兴各个方面的一项系统性工程。

如今，在“千万工程”泽被20多年的浙江，乡村发展、城乡关系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貌。在浙江全省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也不高，但如今的乡村，人才回流，创业潮涌，乡村成了他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潜力。这也是乡村最该有的样子！

一号文件中出现“千万工程”字样，这让我们不由想象，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惠及神州大地的样子，这也让我们理想中的乡村更可触摸、更具现实性。在“千万工程”理念方法的指导下，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将不再遥远。这也是我们学习中央一号文件、感受“三农”脉动的一个重要收获。

（来源：中国农网，2024年2月21日）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里程碑式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此后，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稳步迈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取得里程碑式进步，中国创造的力量日益彰显，突出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实现新跃迁、关键前沿技术研发获得新突破、数字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产业结构高级化跨入新阶段。

要素禀赋结构实现新跃迁

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大幅度跃迁。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33278.2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2.64%，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超600万人，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01.5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进一步提升，成为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40万家，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十年内高素质人才资源培养和使用量翻番。2012-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58.97万人升至124.25万人，R&D就业人数从324.7万人升至635.4万人。202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4年，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正在实现。

关键前沿技术研发获得新突破

芯片、5G、量子计算等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华为麒麟9000S芯片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制程达7nm工艺，并通过架构创新与提高晶体管密度，性能接近国外5nm工艺产品。5G定制化基站、5G轻量化技术实现商用部署，工业级5G芯片、模组、网关实现突破，累计发布3项国际标准和90项国家标准。“九章三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光量子信息的技术水平和量子计算性能的世界纪录。

航天工程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圆满发射并对接天宫空间站，标志着我国空间站乘组轮换和科学实验进入常态化阶段。10类、20余款耐辐射、高耐热、高抗寒的国产芯片完成在轨飞行验证。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飞行276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完成可重复试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突破大尺寸整流罩分离技术、大直径舱箭连接分离技术、大推力直接入轨偏差精确控制技术，将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提升至22吨以上。

极地、深海、远洋探索刷新极限。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完成南极科考，最大下潜深度达10909米，填补了我国在极地深潜领域的空白。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超深水大洋科考钻探船“梦想”号顺利试航，其总吨位约33000吨，续航力达15000海里，建有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科考船综合信息化系统，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

作业能力和海域 11000 米钻探能力。

海陆空立体化交通工程迈出新步伐。自主研发的中程窄体干线客机 C919 顺利完成首飞，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交付使用，标志着我国已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的造船工业能力。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完成系统联调联试，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车用芯片、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

多元化清洁能源工程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我国自主研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多个实验中取得重要成果，突破 100 万安培等离子体大电流高约束模式运行控制、高功率加热系统注入耦合、先进偏滤器位形控制等多个关键技术难题。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建成运行，世界首例首批安装 16 台单机容量百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引领水力发电进入单机百万千瓦新时代。首套 300MW 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压缩机和膨胀机成功研制，推动我国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迈上新台阶。

数字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数字经济规模和渗透率快速增长。据测算，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41.5%，占比和第二产业相当，规模和比重位居世界前列。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24%，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大幅提升。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44.7%。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 10.5%。

智能制造突飞猛进。我国已培育 421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3 年，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的增加值分别增长 60.0%、20.5%；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等智能化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3.3%、36.2%，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到 2022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已达 135.7 万台。2022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 290258 台，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日本（50413 台），占据了 52.5% 的全球市场份额，相较于 2012 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十年间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28.8%。

全国性工业互联网构建成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世界前列。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五大国家顶级节点和南京、成都两个灾备节点全部上线，二级节点实现全国各省市区全覆盖，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和 85% 以上的工业大类，培育成型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240 多个，跨行业跨领域平台 28 个，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 8000 万台（套），服务工业企业超 160 万家。5G、量子通信等通信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智）联网、智慧交通网络等融合基础设施国际领先。2022 年，我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份额约为 33%，连续两年增速超过 50%。

数据生产居于世界前列。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22 年，我国数据生产量占全球数据总生产量的 10.5%，居全球第二位，数据存储量的全球占比为 14.4%，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1.57 万亿元。包含数据采集、标注、分析、存储等的数据资源化进程不断深化，数据标注产业围绕北京、长三角、成渝地区向外扩散，已经形成三大产业群，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产业结构高级化跨入新阶段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动能。2018-2023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远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23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为 10.3%，高于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 7.3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9.9% 和 11.4%。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8.4%、14.5%、11.1%；在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1.8%、29.2%。中国已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实现了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方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到一般贸易方式和机电产品与高技术产品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23 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3.92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58.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4.11 万亿元，仅占出口总值的 17.3%。

新能源产品生产规模全球领先。2023 年，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新三样”相关产品产量比 2022 年分别增长 30.3%、54.0%、22.8%；水轮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充电桩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5.3%、28.7%、36.9%；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生物基化学纤维等绿色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8.6%、57.1%、50.7%。全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 14.5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五成，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产量全球占比均超 7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 900 万辆，占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比重超过 60%，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一。2023 年，“新三样”产品出口 1.06 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9.9%。

“三新”经济塑造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持续蓬勃发展。2022 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达 21.01 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17.36%；全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为 43.8 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13.79 万亿元，其中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 11.96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7.2%。线上线下持续融合，快递物流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3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预计超 1300 亿件，同比增长 19.5%，实现“月均百亿”的跨越。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三新”经济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形成并跑之势，部分领域已全球领先。

生产服务业占比超过生活服务业，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大幅度增加。2022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超 35 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接近 60%。2023 年，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占比分别为 27.8%、13.8%、11.3%，现代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逐渐凸显。

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里程碑式进步，是从技术、要素到产品和结构的全面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产业发展在部分关键领域已由“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进入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使中国经济拥有乘风破浪的底气和能力。这样的产业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回升向好、行稳致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 年 2 月 27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